

馮玉祥與西北軍(七)

王禹廷

——西北軍事史話之八

馮玉祥不滿段祺瑞

張作霖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到天津，立即電邀馮玉祥來津與段會面，這是直系垮台以後有名的天津會議。在這個會議中，有如下的重要決定：(一)擁護段祺瑞進京主持政務。段表示要有權才肯出山，張、馮皆表示服從段的命令。但此時段氏沒有實力，一切還是要選就奉軍和國民軍。(二)奉系派盧永祥為蘇浙巡閱使，率領張宗昌、吳光新兩部，沿津浦鐵路南下，攻略蘇、浙，以張宗昌為江蘇督軍，吳光新為浙江或安徽督軍。(三)國民軍沿京漢鐵路南下，向豫、鄂發展。張作霖、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等，於十五日發表通電，擁戴段祺瑞為臨時執政，入京應付時局。

關於段祺瑞的復出，馮玉祥在他所著「我的生活」一書所記「首都革命」一節中，却另有一種說法：

「民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，我到了北苑，知道城中的事業已辦妥，這時胡笠僧和孫二哥(岳

也)都來了。第二天便召開會議，商議正式組軍之事，當決定推我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。胡笠僧和孫二哥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。這時雖已收復首都，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，但知洛吳尚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，他必然不甘屈服，而作最後掙扎。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，果然接到報告說：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。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鄭士琦此時所處的地位至關重要，他若被吳拉攏，則至為可慮，若我們能與之聯絡，則吳佩孚前後受敵，立可使之潰亡。鄭士琦是段祺瑞派系的人，為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，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，以示與皖派連絡，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軍北上。大家亦以為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，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，一時只看見了軍事的成敗，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。孫二哥這個提議竟然全體一致的贊成，真是『失之毫厘，謬以千里』。那知由於這個臨時動議，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。」

奉張既欲撐段之腰以抑制國民軍，馮等也想借段之力以對付吳佩孚，段乃得到張、馮的共同擁戴。何況還有蘇、浙、皖、贛、鄂、閩、豫、陝八省的推請，段自然就成為收拾時局的惟一適當人物。另外還有一個微妙的原因，就是沿海入江的吳佩孚，於十一月十七日到達漢口，同日由齊燮元領銜的二十一個將領，包括蘇、浙、鄂、皖、陝、贛、閩、豫、川、黔、粵等十一省和海軍，發表通電，提議黃河上流及長江各省，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，不承認北京政府的命令。但以後有的人表示否認，有的人表示異議，吳佩孚便離開漢口，軍政府也就空雷無雨了。不過由於他們這樣一鬧，給張、馮以刺激，必須在天津會議上獲致協議，並促成段的早日入京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遂給段氏造成了有利的復出機會。因此，段在天津會議上接受了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，並向張、馮強調和平，勿對東南用兵。也派人到有關各省疏通，請勿輕舉妄動。

段祺瑞於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在天津發

表通電，宣布就任執政後的大政方針。擬於一個月內召開善後會議，以解決時局糾紛，籌備建設方案。三個月內召開國民代表會議，擬撥美國費城會議先例解決一切問題。二十三日由津進京，二十四日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。段祺瑞此次復出，可以說是受了屬於北洋系統的擁戴，失勢流離的吳佩孚，也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由河南電段，表示贊成其應付時局的方針，勸段不要受張作霖和馮玉祥的愚弄。表面上看起來，段好像是衆望所歸，大有作爲，實際上他挫敗之餘，毫無實力，空居高位，左右爲難，已無復以前的雄心和氣魄了。

段祺瑞就職的當日，宣布了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，統率陸海軍。不設內閣總理，實行集權制度。并發表內閣人選，在這個新閣中，沒有一個曾在黃郛內閣任過職的人，連奉系也無人參加，和馮玉祥更是毫無關係，其名單如下：



馮玉祥（左）在北伐時期與西北軍官兵合影。

臨時執政段祺瑞、內務總長龔心湛、財政總長李思浩、外交總長唐紹儀、陸軍總長吳光新、海軍總長林建章、司法總長章士釗、教育總長王九齡、交通總長葉恭綽、農商總長楊庶堪、秘書長梁鴻志。

國父應邀北上原委

當直奉及江浙戰爭，密鑼緊鼓，即將上演之際，國父於十三年九月五日，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，決定尅日與師北伐。十二日，移大本營於韶關，親自督師，由湖南、江西兩省分道出兵。十八日，發表北伐宣言，說明北伐之目的，不僅在推倒曹錕、吳佩孚，尤在打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。十月十九日，任命張繼等爲軍事委員，聯絡北方軍事。并派徐謙爲馮軍（馮玉祥）慰問使，續桐溪爲陝軍（胡景翼）慰問使，王用賓爲直軍（孫岳）慰問使，分向各軍進行活動。

迨馮玉祥等發動首都革命，北方大局顯現急劇變化。國父於十月三十日，由韶關返抵廣州，召集會議，討論應付北方新局勢。在此數日中，馮玉祥等連電，請求國父北上，主持大計。

國父即復電表示同意。來往各電如次：

馮玉祥等十月二十四日電：

「中山先生大鑒：辛亥革命未竟全功，致令先生政策無由施展。今幸協同友軍，戡定首都，此後一切建設大計，仍希先生指示。萬望速駕北來，俾親教誨是禱。馮玉祥、王承斌、胡景翼、孫岳、續桐溪、劉守中、蒯定燮、凌毅、李石曾、李含芳、岳維峻、張之江、李鳴鐘、鄧寶珊叩敬（廿四日）」

國父十月廿七日電：

「北京馮煥章、王孝伯、胡笠僧、孫禹行諸先生鑒：義旗幸舉，大慈肅清，諸兄功在國家，同深慶幸。建設大計，亟欲決定，擬即日北上，與諸兄晤商。先此電達，諸維鑒及。孫文叩感（二十七日）」

馮玉祥等十一月一日電：

「中山先生大鑒：感電敬悉。辛亥革命未竟全功，以致先生政策無由施展。今幸偕同友軍，戡定首都。此役既平，一切建國方略，尚賴指揮，望速命駕北來，俾親教誨，同深企盼。馮玉祥、王承斌、胡景翼、孫岳叩東（一日）」

國父十一月四日及七日兩電：

「北京，馮、王、胡、孫諸先生鑒：來電悉，至佩鑿鑿。此時所務，一在殲除元惡，肅清餘孽。一在勤求治本，建設有序。諸兄開始偉業，必能克底於成。承邀入都，義當就道。日來已由韶返省，部署行事。數日之後，即輕裝北上，共圖良晤。先此奉復，諸維鑒察。孫文支（四日）叩。」

「北京馮、王、胡、孫諸先生鑒：來電敬悉。前聞諸兄驅逐元惡，為革命進行掃除障礙，已深慶幸。茲悉諸兄更努力建設，期貫徹十三年來未能實現之主義，使革命不致徒勞無功，尤為欣慰。文決日內北上，與諸兄協力圖之。先此奉復。孫文陽（七日）叩。」

馮玉祥等對於國父的北上，盼望至為殷切。除了連電促駕外，并派馬伯援為代表，南下歡迎。馬於十一月四日離北京，在南行途中，聞國父已離粵，乃在上海迎候。十一月十七日在滬晉見，面陳馮等歡迎的誠悃，國父至表欣慰。在此期間，段祺瑞和張作霖皆分別電請國父北上，國父也復電同意。乃於十一月四日命令胡漢民留守廣州，代行大元帥職權。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，駐守韶關，主持北伐軍事。但是張繼和丁維汾等，因為張作霖和馮玉祥擁護段祺瑞為大元帥，段派毫無與國父合作的誠意，曾於十一月六日電請國父暫緩北行。國父覺得已經決定而且答應了人家的事，不宜失信中止，所以仍照原定計劃實施。十日，國父發表北上宣言，首先說明「北伐之目的，不僅在推倒軍閥，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，使曹吳覆滅之後，永無同樣繼續之人。……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，永絕跡於國內。使武力與民衆結合，而後成為國民之武力。」最後「主張召集國民會議，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。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之前，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，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、選舉方法等等。」

國父作政策性講話

十一月十三日十時二十分，國父偕李烈鈞、黃昌穀、朱和中、馬超俊等二十餘人，離粵北上，汪兆銘先一日由廣州赴港迎候。經過黃埔，登岸和軍校師生會晤話別。十四日晨二時抵香港，六時換船赴上海。十六日午夜到吳淞口外，十七日晨九時許乘小輪上岸，于右任、石青陽、戴傳賢、楊庶堪、居正、宋子文、蔣作賓、葉楚傖，以及段祺瑞的代表光雲錦、齊燮元的代表凌鐵庵等二十餘人，乘小輪到吳淞口迎接，碼頭上則有上海各界及市民萬餘人歡迎。十九日下午三時，國父在寓邸舉行茶話會，招待上海及日本記者三十餘人，由汪兆銘、邵元冲、戴傳賢、葉楚傖担任招待。國父作政策性講話，歷時一小時三十分鐘，說明：「北上目的有二：一為召集國民會議，這是為對付軍閥。一為廢除不平等條約，這是為了對付帝國主義者。」

這時上海、北京間的水陸交通均不方便。國父為了爭取時間，決定只偕宋慶齡、戴傳賢、黃昌穀繞道日本轉赴天津，其餘的人則乘船到天津會合。國父二十三日到長崎，二十四日到神戶，停留一週，講演十餘次，提示日本人應該作東方王道的干城，不要作西方霸道的鷹犬。三十日離神戶，十二月四日到天津。在碼頭歡迎的有兩萬多人，段祺瑞和國民一、二、三軍的代表及各團體代表，均登船恭迎，上岸後下榻於張園行館。

張作霖與國父晤談

這天下午，張作霖派代表到張園向國父致候。國父旋即拜訪張作霖，兩人暢談了一點多鐘，在座的有李烈鈞、葉恭綽、張學良、楊宇霆、吳光新等人。張接待國父時，態度雖然顯得倨傲，但頗誠懇。據李烈鈞自傳云：「孫向張表示感謝接待盛意後，即賀其擊敗吳佩孚之功。張竟呈不懌色謂：『自家打自家人何足為意！』致使呈現僵局，李急起立向張言：『雨帥所言雖是，然若不將國家之障礙如吳佩孚諸人者剷除，則欲求國家之進步與人民之幸福終屬無望。孫先生之賀言實有價值，亦惟雨帥能够當之無愧！』張作霖乃大笑。孫因徐徐曰：『協和（按，係李烈鈞的別號）之言極是，自民國成立以來，得我贊詞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。』語至此滿堂為歡。」又據葉遐菴（恭綽）先生年譜云：「總理抵津之日，訪張（作霖）於其寓邸，寒暄方畢，張即起言：『孫先生，我係粗人，今坦白言之，我是捧人的，我今天能捧姓段的，就可捧姓孫的。惟我祇反對共產，如共產實行，雖流血所不辭』云云。其言甚顯豁，可知其固出於誠意者也。然段派聞之頗不懌，因是影響及於孫、段之合作。及總理抱病入都，欲與段面決大計，段亦僅派許世英向先生視疾，周旋其間，卒未謀一面。總理之喪，亦未親臨弔唁，則其間之隔閡可知矣！」又國父與張晤談時，曾問張作霖：「處日、俄兩大之間，果操何術而能免其猜嫌？」張作霖答說：「我抱定小事不妨吃虧，大事決定不上當，捨此亦無他策。」事後張作霖曾對汪兆銘說：「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一個很難說話的人，今天見了面

，才知道他是一個溫厚君子。可惜北京的各國公使都反對他，大概因為孫先生聯俄的緣故。你不可以請孫先生放棄聯俄的主張，我張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國公使和孫先生要好的。」

三角同盟無形瓦解

國父為國奔波，終年辛勞。此次北上，由廣州繞道日本到達天津。季候是冬天，地點是由亞熱帶到酷寒的北方，這種時地變遷，對於一個生長於南方的人，一時自難適應。加以舟車勞頓，消耗體力，所以他到天津以後，即患重感冒，肝部亦有劇痛，當即留津休療。十二月十八日，段祺瑞特派許世英、葉恭綽兩人來津探視，迎請入京。談及北京政情，國父知道段祺瑞已經向外交團承諾遵守已有的條約，并積極準備召開善後會議。這與國父宣布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，完全背道而馳，引起他的極度不快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段祺瑞公布了善後會議條例，加緊籌開善後會議。十四年一月一日，段氏分別致電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香港各地以國父為首的各方名流多人，邀請到北京出席，這是段決心與國父不合作的明證。段是張作霖等人捧出來的，他對國父既然不惜決裂，張對國父也無支持的表示，原來為了打倒直系而結合的孫、段、張三角同盟，至此已無形解體。新興的國民軍，內部亦不單純，馮玉祥勢力弱，禁不住張作霖的强大壓力，移駐察綏。國父孤掌難鳴，他北上的救國宏願，遂告落空。而且又在病中，顯得進退為難。但是他為了顧全大局，不惜面對現

實，遷就讓步。於一月十七日致函段祺瑞，提出關於善後會議的兩項條件：○善後會議應加入人民團體的代表，如實業團體、商會、教育會、學生聯合會、農會、工會等代表。○善後會議涉及之軍制財政最後決定之權，還之國民會議。并聲明此條件如被容納，則對於善後會議當表贊同。誰知段祺瑞固執到底，更引起國父的憤怒，病勢因而加重。為了謀求補救和便於療養，他接受了隨行人員的殷切建議，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離開天津，下午四時到達北京前門車站，在場及沿途歡迎的有三十萬人之多，爭欲瞻仰風采，向這位開國偉人致最大的敬意。

國父逝世治喪經過

國父到北京後，先住北京飯店，後來移居設在鐵獅子胡同的行館（顧維鈞的私宅）。因為病情日重，於二月二十五日移住協和醫院接受治療，迄未好轉，延至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，不幸與世長辭。隨侍在側的有孫科、張人傑、吳敬恆、汪兆銘、宋子文、孔祥熙、邵元沖、戴傳賢、鄒魯、戴恩賽、陳友仁等。

北京政府當日下午令云：

「前臨時大總統孫文，倡導共和，肇興中夏。辛亥之役，功成不居。仍於國計民生，殫心擊劃，宏謀毅力，薄海同欽。本執政夙慕耆勳，亟資匡濟，就職伊始，敦勸入都。方期克享遐齡，共壽國是。天胡不愍，遽奪元勳。軫念艱虞，彌深愴悼。所有飾終典禮，着內務部詳加擬議，務極優隆，用副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。此令。」

內務部當即議決予以國葬，但為國民黨在北京的中央委員會會商拒絕，決定葬儀用國民體制，以示平等。

國父靈柩於三月十九日移至中央公園社稷壇，二十四日發喪致祭，四月二日上午移靈於北京西郊的西山碧雲寺暫厝，等待適當時期，再行移葬於南京紫金山。自國父逝世之日起，到追悼、移靈至西山為止，北京城籠罩在一片哀戚中，憑弔、與祭及送靈的人，不下數十萬人之多。

曠代偉人，從此長眠。遺留給他的同志和國人的是：偉大的精神，卓絕的風範，博大精深的遺教，和一個紛爭混亂的國家，以及拯救這個國家的神聖責任。

在此期間，馮玉祥因為遠在張家口，不能前來祭奠，特電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謂：「凡一切用錢、用人、用物之事，望悉聽協和（李烈鈞）之命。倘因此發生意外，吾兩人當共負其責。」鹿持電訪李烈鈞，一切商承辦理，故多順利。國父停靈中央公園，發喪致祭，以至移靈西山，皆由鹿鍾麟派兵負責警衛。而移靈路上由西苑到碧雲寺的一段公路，因為年久失修，坎坷不平，也由鹿派兵一團，在兩天之內，全部修整完好，以利靈車經過。至於喪祭費用，則是由孔祥熙籌辦的。

張馮之間劍拔弩張

當直奉第二次戰爭醞釀及進行期間，段祺瑞、張作霖和馮玉祥三方面的利害和目標是一致的，所以能够合作。但在共同的敵人被打倒以後，

段、張、馮三系的利害衝突，便一一展現出來，明爭暗鬥，糾纏不清。此時段氏毫無實力，一切有賴於張作霖和馮玉祥的支持。他必須把他與張、馮的關係以及張、馮之間的關係搞好擺平，從而操縱運用，方可維持政局的安定和自己一系權益的爭取與保持。而張、馮兩方，由於地盤爭持及人事安排，形成了短兵相接，積不相能之勢。關於中央政權，因為主客觀各種形勢演變的需要，由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，重組內閣，算是得到一時的解決。於是張作霖於十一月二十四日，由天津進入北京，從事進一步的圖謀發展。張未到北京以前，奉系大將李景林先一日率部入京，預為布置。李景林在直奉第一、二兩次戰爭中，戰功煊赫，所以在奉系將領中氣節很高。他到北京後，將所部分駐城內外重要地點，迫使國民軍遷讓。郭松齡緊跟着帶了一團精銳，進駐北京城北的黃寺，控制了北京城北面的兩個城門。張學良也帶了一營衛隊，進駐城內張作霖的行館順承王府，嚴密警衛。由於奉軍源源開入北京，壓迫國民軍讓出天津、北京、保定、宣化等處防地，引起馮系諸將的極度憤怒和不安。十一月三十日晚間，胡景翼和孫岳，聯袂見馮，把自己防地被奉軍逼迫讓出的情況向馮陳訴。對於張作霖咄咄逼人，根本不把國民軍放在眼裏當做友軍的種種難堪，實在無法忍受。建議馮採取「擒賊擒王」的手段，趁張氏父子在京的機會，把他們就地解決，奉軍失去了頭腦，便不難予以收撫。他們當時拏出預先準備好的一道命令，請馮簽署，立刻行動。馮也感覺到和奉張不易相處，聽了他兩人的話，

頗為動容，乃令鹿鍾麟轉飭担任北京警衛的部隊，準備應變。但是馮玉祥一生做事，穩重有餘，果決和狼勁不足。他們經過進一步詳細研究以後，認為問題并不如此簡單。奉軍這次是以備戰姿態進入北京，而且後續大軍源源入關，密布天津及冀東一帶。如果突襲不能迅速順利的得手，必生更大戰禍，使北京城遭受砲火摧殘，且將無法善其後。所以馮氏力主慎重，沒有實施這個計劃。不料此一秘密，很快的洩漏出去。張作霖於十二月二日的早晨得到消息，立即專車出京赴津。并下了一個緊急命令，所有駐京的奉軍，立即全部撤離。奉軍退出後，遺留下來的防地，仍由馮軍接收，北京又重歸馮軍掌握。張作霖離京匆匆，并未向段祺瑞辭行，但到天津以後，仍向段表示好感，雙方信使不絕，連繫密切。這時的三方關係，段、張之間似乎比段、馮之間要好一點。

地盤人事幾番曲折

張作霖出京後，於十二月五日電請北京政府，裁撤各省巡閱使，他願由所任的東三省巡閱使先行開始，以為倡導。六日，他又通電已將鎮威軍（按，這是第一次直奉戰爭開始時，張自定的軍銜）名義取消，并停止戰鬥形式。十日，馮玉祥通電取消國民軍名義，并即解除總司令職務。這兩大軍頭，雖然同時擺出了罷兵的姿態，但骨子裏的利害矛盾，仍然是無法解消。不過因為張作霖此時正想飲馬長江，向東南大力伸展，在北方不想多樹敵人，所以不為己甚，和馮玉祥暫能相安。

此時急待解決的問題，是地盤分配和人事安排。首先是直隸督辦的人選，段、張、馮都想派自己的人出任此一要職，俾能掌握直隸。段祺瑞於十二月三日，明令發表盧永祥為直隸督辦。盧係段系大將，多年來坐鎮浙江，統攝東南。不久前被孫傳芳和齊燮元聯合打垮，即赴東北，依附張作霖，出任張之副司令，進關討直。段氏以他督直，對段系自然有很多的好處，同時也可作為張、馮之間的緩衝。可是張作霖對於直隸并不放手，乃以向東南發展為理由，向段進言，對盧愆慮。盧覺得如能榮返東南，固所深願。於是段氏又於十二月十一日下令，任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，率領奉軍張宗昌等部，沿津浦鐵路南下，直隸督辦改由李景林繼任。張作霖對於直督一職，原來主張由王承斌繼續担任。因為王是東北人，第一次直奉戰爭，奉軍敗退出關，吳佩孚令王承斌率軍追擊，王到山海關適可而止，放了奉軍一馬，張作霖心存感激。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，王承斌不滿吳佩孚的作風，既因孫岳的拉攏，參與馮玉祥等倒直運動，又與張作霖密通款曲。張答應打倒直系以後，仍由王担任直隸督辦。可是奉軍戰勝，李景林首先率部進入天津，大有衣錦還鄉（王是直隸人）之概，對於直督一席，志在必得。等到張作霖隨後到津，尋找王承斌，欲踐前言。李景林却從中作梗，不但使張、王兩人未能見面，而且把王承斌收集舊部重新編成的第二十三師，也給繳械遣散。因此，張作霖雖然不是有意失信，王承斌却告落空，直督一職，便落到李景林的頭上。這樣一來，段、張雙方固然稱心，馮

系却大為惱火。因為天津是馮軍於十一月三日首先攻入的，論功酬庸，直隸督軍應該由馮系的人出任。馮玉祥極力支持孫岳，孫是直隸人，很有意掌握本省的政權和地盤。不料李景林於十二月五日率軍到達天津後，氣勢汹汹，馮軍爲了避免衝突，故而撤離天津，表示退讓。後來居然由李景林出任直督，李部又向國民二、三軍的駐地節節進迫，二軍岳維峻退出保定，三軍孫岳部也讓出大名。直隸全省，除了冀南與河南接壤的少數地區外，均入奉軍的掌握。國民軍各將領大爲不快，曾聯名向北京政府提出意見，請派孫岳爲直隸省長，也未如願。

馮玉祥退隱天台山

馮玉祥自十一月中天津會議後回京，心情頗爲苦悶，大有拏不起放不下之勢。他要肅清殘留的直軍，顧慮吳佩孚捲土重來，周旋進關的奉軍和伺隙而動的皖系。而國民軍內部，也有了若干問題。楊村之戰，本來以爲一舉即可得手，不料所部大將張之江、李鳴鐘率部進攻，連戰均未奏功，直待後起的韓復榘率部加入，才得打進天津。馮對所部的戰力，需要重新檢討評估。二、三兩軍的背景、素質和實力既不相同，又各有其願望和要求，對方乘其弱點加以運用，弄得國民一、二、三軍之間，已不如最初的團結與諧和。黃郛內閣解散，奉軍強力凌壓，段系構煽操縱，在在顯露出複雜微妙的糾紛。馮氏本以治軍作戰見長，一旦面臨如此困擾的政治問題，便感覺心灰意冷，乃萌退志。於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向段

祺瑞提出辭呈，通電下野，表示打算出洋遊歷，并無在北京貪戀權位之意。另電吳佩孚，約請一同釋兵出洋。段祺瑞和張作霖對於馮之請辭，均表慰留。段准馮休假一個月，馮即赴天台山（一作天泰山）休息，擺出堅決求去的姿態。天台山在北平西郊的西山附近，山不甚高，一座小佛寺，有房二、三十間。馮入山後，致函黃郛，謂「目曠神怡，有迴出塵寰之概，至爲暢適。此間已爲吾兄掃除房舍，敬候駕臨，即請惠然蒞止。」此時黃在北京城裏也很苦悶，故即應邀到山作客。據黃夫人沈亦雲女士說：「膺白山居，我只去過兩次，是送應用的衣服和藥品。我第一次上山與馮先生共餐，滿桌都是素菜。每人一碗麵條，麵色灰黑，白水黃，上澆麻油。我和膺白向不擇食，對此亦殊難下咽。有一盆白菜，帶點酸辣，馮連連讓客說，這個好吃，這個好吃。……我和馮太太談話之際，一個五、六歲的女孩進來問說：『娘，我現在可以去掃地否？』馮太太答應說：『可以。』她就拿了掃帚到外面去掃地。馮太太告訴我：馮先生治家很嚴，要孩子們吃苦。與兒女共飯，常常問：『你爺爺做什麼的？』答『木匠』。又問：『你爸爸呢？』答『當兵』。以勤苦教育兒女，故孩子們以工作爲玩意。又說：馮先生幼年沒機會上學，故渴慕讀書，看書往往到深夜。」

段張馮劃勢力範圍

馮玉祥入山後，連續向段祺瑞提出四次辭呈，堅決求去，段氏均未批准。因為馮部大軍，駐紮北京城郊，控制着京畿局勢，段對馮的出處和

所部軍隊防務的安排，不能不慎重考慮。於是北京到天台山的道上，時有冠蓋往來。經過段、張、馮三方面不斷磋商，北京政府於十四年的歲尾年頭，先後發表了下面一連串的人事命令：

張作霖爲東北邊防督辦兼墾務督辦。

馮玉祥爲西北邊防督辦（陸軍檢閱使裁撤）
盧永祥爲蘇皖宣撫使。

李景林爲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。

張宗昌爲山東軍務督辦。

胡景翼爲河南軍務督辦。

孫岳爲河南省長、豫陝甘剿匪總司令。

關朝璽爲熱河都統。

張之江爲察哈爾都統。

李鳴鐘爲綏遠都統。

我們看了以上的人事安排，就可很清楚的瞭解，第二次直奉戰爭和首都革命以後，擾攘數月的北方局面，獲得了一時的解決。奉軍入關，得到直隸、山東和熱河，并沿津浦鐵路向南發展。國民一軍（馮玉祥）控制京畿、察哈爾和綏遠，國民二（胡景翼），三（孫岳）軍掩有河南及直隸南部，并向西北發展。

這一安排，對張、馮雙方都可以說得過去，他們自然都表示滿意。於是張作霖於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回奉天。馮玉祥於一月十三日宣布銷假，不久，將其總部移往張家口。張、馮兩大實力派既已各有所得，段祺瑞也就高踞有名無實的國家元首，北方政局，暫告安定。可是好景不長，這種局面勉強維持了一段時間，不幸又宣告破裂，大動干戈了。